

丰子恺“童心”思想溯源及辨异

刘炜¹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丰子恺“童心”思想的形成,同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明清启蒙思想、儒道佛三大思想传统的影响。丰子恺深受五四时期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儿童热”的影响,但拒绝其中的斗争主义,表现为和平的爱的“童心”观;明清启蒙思想中李贽、龚自珍等人的“童心”说是其思想的重要来源,但他更为倾心的却是袁宏道、袁枚等人的“性灵”说;儒道佛传统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道家的精神才是其“童心”思想的真正内核。丰子恺从丰富的思想传统中接受广泛的影响,并在自己的理解中加以取舍、融通,最终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童心”思想。

【关键词】: 丰子恺 童心 五四 明清启蒙 儒道佛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0)05-0014-07

丰子恺(1898-1975)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其最具特色的美学观念应该是散布在他的艺术理论与创作中的“童心”思想。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大概形成于1927年左右。这一年,丰子恺发表数篇关于“童心”的文章,此后则时有论及、随处可见,“童心”思想遂成为贯穿其一生的核心性的美学观念。

在丰子恺关于“童心”的诸多文章中,最能全面表述这一思想的是1927年的《告母性》一文。此文似乎尚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故不避辞费,节引如下:

你们的孩子,不是常常认真地对你们提出不可能的要求的么?例如要你们给他捉月亮,要你们给他摘星,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呼醒已死的小猫,这等在你们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们认真地要求,志在必得地要求,甚至用放声大哭来要求。可知这明明是他们的真实的热情。在他们的心境中,这等事都可能——认真可能,所以认真地提出要求。故他们的心境,比我们的广大自由得多。我们千万不要笑他们为童稚的痴态,你该责备我们自己的偏狭!他们是能支配造物的,绝非匍匐在地上而为现实的奴隶的我们所可比。

你们的孩子,不是常常热中于弄烂泥,骑竹马,折纸鸟,抱泥人的么?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等游戏中,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也不感其苦,把吃饭都忘却。试想想看,他们为甚么这样热中?与农夫的为收获而热中于耕耘,木匠的为工资而热中于斧斤,商人的为财货而热中于买卖,政客的为势利而热中于奔走,是同性质的么?不然,他们没有目的,无所为,无所图。他们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他所谓“自己目的”,这真是艺术的!他们不计利害,不分人我,即所谓“无我”,这真是宗教的!慎勿轻轻地斥他们为“儿戏”!此间大人们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利己的,都是卑鄙龌龊的,安得像他们的游戏的纯洁而高贵呢!

你们的孩子,不是常常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为泥人啼笑,或者不问物的所有主,擅取邻儿的东西,或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给他人的么?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原是平等的,一家的。天地创造的本意,宇宙万物原是一家人,人与狗的阶级,物与我的区别,人与己的界限……这等都是后人私造的。钻进这世网而信守奉行这等私造的东西,至死不能脱身的大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奴隶的“小

作者简介: 刘炜(1978-),男,湖北荆州人,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国近代诗学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50016)。

人”；而物我无间，一视同仁的孩子们的态度，真是所谓“大人”了。^{[1]129-130}

仔细阅读上面三段文字，可以清晰地发现，丰子恺的“童心”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不为现实奴役的广大自由的心境；二是无我无目的的超功利的境界；三是物我无间一视同仁的态度。丰子恺的其他相关论述都可以视为对以上三方面内容的进一步的阐释和论证；丰子恺的重要理论观念，如“苦闷”说、“绝缘”说、“同情”说等等，则可以视为对以上三方面内容的进一步的凝炼和深化。

那么，丰子恺何以会形成其“童心”思想？他主要受到哪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又和这些思想观念有何差异？本文认为，丰子恺“童心”思想的形成，按照时代之远近，首先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次是受到明清启蒙思想的影响，再次是受到儒道佛传统的影响。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1925年12月，俞平伯儿童新诗集《忆》由北京朴社出版，其中收有丰子恺为该书所作插图18幅。^{[2]116}这些插图的创作是丰子恺“童心”思想的初次表露，开启了他作品中追求纯真、以儿童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3]136}由此我们推断，丰子恺最初对儿童的关注、对童心的思索，可能是直接受到俞平伯的影响。

但俞平伯出版儿童新诗集《忆》，不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儿童热”的一个具体事例，正如叶圣陶出版童话集《稻草人》、冰心出版散文集《寄小读者》。钱理群先生指出：“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开端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股‘儿童热’。……在上述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学活动与学术活动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人们如痴如狂地向往着‘童心’的世界。”^{[4]140}所以，从一个更宏阔的视野来看，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儿童热”的时代产物。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周作人对丰子恺的影响。因为周作人无疑是五四“儿童热”的“最热心的倡导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更成为‘儿童热’的思想纲领”。^{[4]141}而且，在俞平伯的《忆》出版之后，周作人曾为其撰写书评《〈忆〉的装订》，对此书尤其是丰子恺的漫画给予高度评价。这无疑会极大地增进丰子恺对这位文坛领袖的感情，进而接受其思想的影响。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

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是植物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或说话，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即使不说儿童的权利那些话，但不自然地阻遏了儿童的想象力，也就所失很大了。^{[5]124}

在周作人看来，“儿童与原始人类的思想里都存在着‘泛神论’的倾向，其感情表现就是一种‘泛爱’，在对人类、自然普遍的‘爱’中拭去一切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界限与距离，达到自我与宇宙万物的融合，也即超越”。而“这样的境界、目标也是‘五四’时代的作家们所神往的”。^{[4]152}周作人以及五四作家的这种思想观念，显然影响到了丰子恺“童心”思想中物我无间一视同仁的态度，对照上引丰子恺《告母性》一文即可见出。

但是，丰子恺的“童心”思想与周作人等五四作家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为对儿童“蛮性”的取舍上。周作人在《小儿争斗之研究·译者序》中说：

盖儿童者小野蛮也，自居小天地中，善遂其生，唯以自力解决一切。其斗也，犹野人之战，所以自卫其权利，求胜于凡众，而其间亦自有法律自有道德为之调御。长者不察，阑加诃禁，重伤其意，而亦难期有功。^{[5]59}

周作人以及部分五四作家对这种原始“蛮性”的呼唤，虽然并不能代表所有五四作家的“儿童”观念，但在当时乃至以后都

影响甚大,促发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对“原始生命力”的不懈追求。^{[4]151}这种“蛮性”的“儿童”观念,显然为丰子恺所不取。丰子恺在《童心的培养》一文中说:

艺术教育就是教人这种做人的态度的,就是教人用像作画、看画的态度来对世界;换言之,就是教人绝缘的方法,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学做小孩子,就是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申说起来:我们在世间,倘只用理智的因果的头脑,所见的只是万人在争斗倾轧的修罗场,何等悲惨的世界!日落,月上,春去,秋来,只是催人老死的消息;山高,水长,都是阻人交通的障碍物;鸟只是可供食料的动物,花只是结果的原因或植物的生殖器。而且更有大者,在这样的态度的人世间,人与人相对都成生存竞争的敌手,都以利害相交接,人与人之间将永无交通,人世间将永无和平的幸福、“爱”的足迹了。故艺术教育就是和平的教育、爱的教育。^{[6]235-236}

丰子恺认为,“童心”的培养,需用艺术教育的方式,而艺术教育则是“和平的教育、爱的教育”,其目的正在使人与人之间不再“以利害相交接”,不再“都成生存竞争的敌手”。如果说周作人等五四知识分子的“儿童热”是斗争主义的,那么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则是和平主义的,表现为和平的“童心”观、爱的“童心”观。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丰子恺接受上海《亦报》邀请,为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作插图69幅,以一文一图的形式连载发表。^{[2]599}“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批无拘无束‘童心’四溢的作品。”^{[3]285}丰子恺将其最后的“童心”作品献给周作人,或许有某种饮水思源的意味,以此感念这位曾经深刻影响他的五四文坛领袖,虽然他们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

二、明清启蒙思想

俞平伯《忆》的前页上,题有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的两句诗:“瓶花妥帖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后来这两句诗也为丰子恺在《儿童与音乐》一文中所引用:

每一曲歌,都能唤起我儿时的某一种心情。记述起来,不胜其烦。诗人云:“瓶花妥帖炉香定,觅我童心二十年。”(原文如此——引者注)我不须瓶花炉烟,只消把儿时所唱的许多歌温习一遍,二十五年前的童心可以全部觅得回来了。^{[7]168}

因而我们推断,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可以从俞平伯往前追溯,直至龚自珍。而龚自珍之前,力倡“童心”说的则是明代思想家李贽。作为明清启蒙思想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贽和龚自珍无疑是丰子恺“童心”思想的重要来源。

但是,丰子恺与李贽和龚自珍的“童心”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差异较大。李贽和龚自珍的“童心”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私”的肯定。李贽在《德业儒臣后论》一文中说: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其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8]

龚自珍在《论私》一文中说:

问曰:敢问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闰月,以处赢缩之度,气盈朔虚,夏有凉风,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华离,为附庸闲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床闼之内,日月有私也。圣帝哲后,明诏大号,劬劳于在原,咨嗟于在庙,史臣书之。究其所为之实,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且夫忠臣忧悲,孝子涕泪,寡妻守雌,扞门户,保家世,圣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册之所纪,诗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

他人之亲，而慈其亲？寡妻贞妇何以不公此身于都市，乃私自贞私自葆也？^[9]

李贽和龚自珍都认为，“私”就是对个人利益的欲求，从圣帝哲后忠臣孝子以至服田居家的匹夫匹妇，无不有私，这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私”才是每一个人最真实的心理。所以在李贽和龚自珍看来，“童心”即“真心”，“真心”即“私心”。我们虽然不能据此认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完全重叠，但“童心”包含着“真心”和“私心”则是无疑的。而前文已述，丰子恺“童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无我无目的的超功利的态度，也就是对“私”和“利”的超越。显然，丰子恺不同于李贽和龚自珍。如果说丰子恺对李贽和龚自珍有所取，那么除了“童心”这个概念本身之外，则应该是“真心”之旨，而非“私心”之意。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在明清启蒙思想中，李贽和龚自珍是较为激进的一路，除此还有袁宏道和袁枚较为温和的一路。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其实远于前者，而近于后者。袁宏道和袁枚都主张“性灵”说。所谓“性灵”，“实质上是指从传统观念、世俗礼法等重重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自由的心灵”^[10]。“性灵”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趣”。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愧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憚，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11]

袁宏道认为，“趣”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自然而自由的心境，“趣”唯童子能得之，“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及年长官高，则去“趣”渐远。“趣”也正是丰子恺“童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丰子恺在《童心的培养》中说：

童心，在成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小孩子的生活，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他们为趣味而游戏，为趣味而忘寝食。在游戏中睡觉，在半夜里要起来游戏，是我家的小孩子的常事；推想起来，世间的小孩一定大致相同。为趣味而出神的时候，常要做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或不可能的事，因而跌跤，或受伤，也是我家的小孩子的常事。然这种全然以趣味为本位的生活，在我们大人自然不必，并且不可能。如果有全同小孩一样的大人，那是疯子了。然而小孩似的一点趣味，我们是可有有的。^{[6]236}

丰子恺认为，“童心”就是“趣味”，也就是一种自由而愉悦的心境，小孩子的生活全然以“趣味”为本位，大人则不可能。二人所说何其相似。丰子恺是否受到袁宏道的影响，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但袁宏道乃至公安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影响甚巨，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都是其热情的信奉者，而这些人皆为丰子恺的同道好友，丰子恺即使没有直接受到袁宏道影响，也会间接受到周作人等人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袁宏道“性灵”说的直接继承者是清代的袁枚。丰子恺对袁枚可谓青睞有加。他曾以“我的书”为题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书：〈芥子园画谱〉》，一篇是《我的书：〈随园诗话〉》。《芥子园画谱》是丰子恺初学绘画时的启蒙经典，对其走上绘画之路具有重要影响。将《随园诗话》与《芥子园画谱》并列，可以想见丰子恺对《随园诗话》的崇敬之情。丰子恺曾摘录其中数则，对其中反复古、反堆砌、主张空灵自由的诗学观念表示欣赏与认同，^[12]而这正是“性灵”说的重要内涵。

简而言之，丰子恺的“童心”思想，深受明清启蒙思想的影响，追求真率和自由，但它更接近于袁宏道和袁枚的以“趣”为主的“性灵”说，而不是李贽和龚自珍的以“私”为主的“童心”说。

三、儒道佛传统

1927年,丰子恺在《告母性》一文中,曾明确宣示其“童心”思想与儒家传统的关系: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前文所说的孩子的本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的造作后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成人之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受动地盲从这世间的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故朱子的注解:“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所谓“通达万变”,所谓“不为物诱”,就是能动地观看这世间,而不受动地盲从这世间。常人抚育孩子,到了渐渐成长,渐渐尽去其痴呆的童心而成为大人模样的时代,父母往往喜慰;实则这是最可悲哀的现状!因为这是尽行放失其赤子之心,而为现世的奴隶了。^{[1]131}

丰子恺认为,他的“童心”就是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也就是“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可见丰子恺明显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

但是,丰子恺的“童心”并不完全等同于孟子的“赤子之心”,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这首先表现为二者修养方法的不同,也就是对“赤子之心”和“童心”如何进行保护和培养的不同。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君子既要“以仁存心”,又要“以礼存心”,充分肯定“礼”对于保护和培养“心”的重要作用。但是丰子恺恰恰相反,他认为“礼”是对“童心”的破坏,必须去除。丰子恺在《儿童的大人化》中说:

例如据我所见的实例:有的父母教孩子储蓄金钱。有的父母称赞孩子会拾得金钱、节省金钱。有的父母见孩子推让邻人给他的糖果,说他懂得礼仪而称赞他。有的父母因被孩子用手打了一下,视为乖伦,大怒而惩罚孩子。有的父母教孩子像大人一样地应酬,装大人一样的礼貌。有的父母称赞孩子的不噪而耐坐。——这等都是不自然的、不应该的,都是误解孩子、虐待孩子。因为金钱的效用、孝的伦理、谦让的礼貌,以及自己抑制的工夫,都是大人的世界里所有的事,在孩子的世界里是没有的。孩子的看法,与大人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金钱是一种浮雕的玩具,钞票是同香烟牌子一样的一种花纸。明明欢喜糖果,邻人给他,为甚么假装不要?他们不听父母话的时候,父母打他们;父母不听他们话的时候,他们也不妨打父母。(打的一动作的意义,他们还没有明白。据我的所见,孩子的动作都是模仿大人的。如果大人不曾打骂过孩子,孩子决不会打骂别人。)又揖让进退,实在是一种虚饰的、装鬼脸之类的动作,他们看来如同一种演剧。游戏、运动,在他们是出于自动的、最幸福的生活;而不喧闹,或耐坐,在他们看来,是同被拘禁一样的。往往一般大人称赞孩子的会储钱,懂礼貌,不好动,说:“这真是好孩子!”我只觉得这同弄猴子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猴子,不是人世间最悲惨的现象么?^{[6]223}

“孝的伦理、谦让的礼貌,以及自己抑制的工夫”,这些都是儒家所倡导的“礼”的具体表现,在丰子恺看来,它们都是对孩子的摧残,对童心的破坏。那么如何保护和培养“童心”呢?丰子恺在《告母性》中说:

要收回这赤子之心,用“教育”的一种方法。故教育的最大的使命,非在于挽回这赤子之心不可。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谓放心者,就是放失了的赤子之心。夫人们是孩子的赤子之心未放失时的最初的教育者,只要为之留意保护,培养,岂不是很简便的么?

大人们的一切事业与活动,大都是卑鄙的;其能庶几仿佛于儿童这个尊贵的“赤子之心”的,只有宗教与艺术。故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培养他们这赤子之心,当然最为适宜。从小教以宗教的信仰,出世的思想,勿使其全心固着于地面,则眼光高远,志气博大,即为“大人”。否则,至少从小教以艺术的趣味。音乐,绘画,诗歌,能洗刷心的尘翳,使显出片刻的明净。即艺术能提人之神于太虚,使人得以看清楚世界的真相,人生的正路,而不致沉沦,摸索于下面的暗中了。^{[1]131}

丰子恺说得很明确,就是“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培养他们这赤子之心”,也就是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和培养其超越世俗的精神。所以,由二者修养方法的不同,进一步可以透视其精神旨趣的差异。孟子的“赤子之心”是入世间的,所以要接受“礼”的指引;丰子恺的“童心”是出世间的,所以要反对“礼”的束缚。因而,丰子恺虽然借用了孟子“赤子之心”的概念,但其思想内核其实更为接近道家,而非儒家。

1935年,丰子恺在《谈自己的画》一文中说:

我看见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赏者。八指头陀诗云:“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我当时曾把这首诗托人用细字刻在香烟嘴的边上。这只香烟嘴一直跟随我,直到四五年前,有一天不见了。^[13]

丰子恺对八指头陀的这首诗爱不释手,认为它很能表现自己的“童心”思想。这表明,丰子恺受到了以八指头陀等人为代表的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细读八指头陀这首诗,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既是佛家的,也是道家的。“物欲蔽天真”云云,显然是道家的术语、道家的思想。

关于丰子恺的“童心”思想与佛道之关系,作为一代大儒的马一浮其实看得比较清楚。1927年2月,丰子恺以儿童和童趣为主题的《子恺画集》出版,10月再版,马一浮为之题词如下:

题子恺画集

吾友月臂大师为予言丰君子恺之为人,心甚奇之。意老氏所谓专气致柔,复归于婴儿,子恺之于艺,岂其有得于此邪。若佛氏五行中有婴儿行,其旨深远,又非老氏所几。然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情识之表,乃与婴儿为近。婴儿任天而动,亦以妄想缘气尚浅,未与世俗接耳。今观子恺之贵婴儿,其言奇恣,直似不思议境界。盖子恺目中之婴儿,乃真具大人相。而世所名大人,嵬琐忿矜,乃真失其本心者也。赵州有“孩子六识”话,予谓子恺之画,宜名“孩子五阴”。试以举似月臂大师,当以予为知言。丁卯九月书与丰子恺教授。蠲叟。^[14]

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第十章)又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老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童心”的思想家。所以马一浮认为,丰子恺“贵婴儿”的“童心”思想是有得于老子。至于佛教,也有“婴儿行”的说法。所谓“婴儿行”,出自《大般涅槃经》,是菩萨所修五种行法之一。《大乘义章》卷十二解释说:“婴儿行者,有二种,一者自利,二者利他。若论自利,从喻为名,行离分别,如彼婴儿无所辨了,名婴儿行。若论利他,从所化为名,如经中说,凡夫二乘始行菩萨如似婴儿,化此婴儿,名婴儿行。”“婴儿行”包含两个方面,从其“自利”的一面来看,“如彼婴儿无所辨了”,近于道家;从其“利他”的一面来看,“化此婴儿”,则近于儒家。老子的“婴儿”思想,显然只能得其“自利”之一面,而与“利他”之一面无涉。所以马一浮说,佛教“婴儿行”的思想其旨深远,非老子所能到。既然非老子所能到,当然也就非丰子恺所能到了。也就是说,在马一浮看来,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受佛教的影响浅,受道家的影响深。

需要注意的是,1927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丰子恺从弘一法师皈依佛教,法名“婴行”,“婴行”或许就是佛教“婴儿行”的省称。但丰子恺虽然皈依了佛教,其思想却始终不属于佛教。严格意义上的佛教思想,如彻底的出世精神、严格的戒律观念、精湛的佛学义理等等,在丰子恺的思想和言行中我们似乎未能看到。1946年,丰子恺在《〈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一文中说:“我的为人与为文,真如前文所说,完全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15]183}又说:“我相信文艺创作是盲进的(实即自然的),不期然而然的……”^{[15]186}这种“为人与为文”的“自然”的观念,正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一言以蔽之,丰子恺虽然同时受到儒道佛三家的影响,但其思想内核既不是儒,也不是佛,而是道,是以道统摄儒佛。

综上所述,丰子恺的“童心”思想来源较为复杂。它不仅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还从儒道佛传统以及明清启蒙思想中汲取诸多养分。而在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传统的影响时,丰子恺都非全盘照搬,而是有所取舍。他深受五四时期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儿童热”的影响,但拒绝其中的斗争主义,表现为和平的爱的“童心”观;在明清启蒙思想中,他虽然也受到李贽、龚自珍等人的“童心”说的影响,但更为倾心的却是袁宏道、袁枚等人的“性灵”说;儒道佛传统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道家的精神才是其“童心”思想的真正内核。总之,丰子恺从丰富的思想传统中接受广泛的影响,并在自己的理解中加以取舍、融通,最终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童心”思想。之所以关注丰子恺“童心”思想的形成,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而鲜活的案例,以观察现代知识人如何接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或者说,传统思想如何进入现代知识人的思想观念与人格精神之中,进而可以反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抑或连续的种种复杂关系。

参考文献:

- [1] 丰子恺. 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九[M]//丰子恺全集.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 [2] 陈星. 丰子恺年谱长编[M]. 修订版.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3] 白杰明. 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M]. 贺宏亮,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 [4] 钱理群. 周作人论[M]. 北京:三联书店,2014.
- [5] 周作人. 周作人论儿童文学[M]. 刘绪源,辑笺.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 [6] 丰子恺. 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十二[M]//丰子恺全集.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 [7] 丰子恺. 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十[M]//丰子恺全集.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 [8] 李贽. 李贽文集:三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26.
- [9]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92.
- [10] 成复旺. 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0.
- [11] 袁宏道. 袁宏道集笺校:上[M]. 钱伯城,笺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63.
- [12] 丰子恺. 文学:卷四[M]//丰子恺全集.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104.
- [13] 丰子恺. 文学:卷一[M]//丰子恺全集.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276-277.
- [14] 马一浮. 马一浮全集:二册(上)[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62.
- [15] 丰子恺. 文学:卷二[M]//丰子恺全集.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